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

主 编◆汪信砚 副主编◆左汉平

晏绍祥 著

人类

春。传统学科，成熟的气
外。从书页中迸发，和组
分。注入本智慧。织知识。
枝。思想量为重新选择。
新的读者“发展”和知识。
树。的“生活”和知识。
老年创造“生活”和知识。
度与给人

史·学·启·示·录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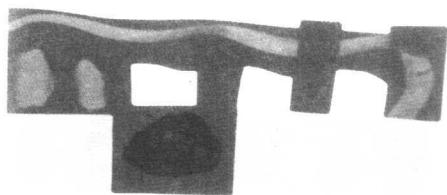
湖
北

社

人类之知

史 学 启 示 录

晏绍祥 著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之知:史学启示录/晏绍祥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

(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汪信砚主编)

ISBN 7-216-02472-9

I. 人…

II. 晏…

III. 史学—普及读物

IV. K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043 号

人类之知—史学启示录

晏绍祥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15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640

定价:14.80 元

书号:ISBN 7-216-02472-9/K·263

序

当代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牢固的知识，没有丰富的智力素养和多方面的智力兴趣，要把一个人提高到道德尊严感的高度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大力倡导文化素质教育，强调人们“应当特别重视那些培养人的灵魂、意识、情感和信念的知识”。苏霍姆林斯基对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视和强调是针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时代而言的，同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极为显著的意义。

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的生存境况极为尴尬的时代。借助于各种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当代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不可胜数的资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过上了过去做梦也不敢想的富足而便利的物质生活。然而，当代人类并未由此进入理想中的极乐世界。与物质生活的富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冲突、宗教淡化、战争危险、热核威胁、技术异化以及人与人的疏离，使得当代人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困惑和迷惘之中。信仰危机、理想缺失、道德失范、自我感、意义感和归属感的丧失以及心态失衡、个性扭曲等等，已成为当代世界极其普遍而又严重的问题。正如一首诗所云：人们走入了手段的王国，却迷失了人的目

标;跨进了物质的天堂,却跌下了精神的深渊。对此,当代许多富有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思想家都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他们指出,如果不能克服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二律背反、走出这种精神的深渊,人类终将失去做为人的尊严感,将会沦为“没有灵魂的机器”或“没有情欲的色鬼”;而要疗治当代人的心理疾患、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借重于教育来重塑人的精神世界。用汤因比的话来说,就是要“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用池田大作的的话来说,就是要“寻求新的人性”,造就“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强烈的责任感和坚强的自制力”的新人。而用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说,则是要特别注意用“像文学、历史这些文科知识”“来充实人的灵魂”。上述这些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们可谓是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实际上是在以各自的方式呼唤着对人的文化素质教育。

当代中国社会既面临着我们这个时代所共有的困扰,同时又内存着它自身所特有的问题。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改革开放之途曲折多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步履维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民的文化素质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代化建设要求人们具有很强的科学精神和法理意识,但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人却是文盲、科盲、法盲,满脑子充斥着家族裙带观念和小农意识;现代化建设呼唤着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许多人却缺少起码的现代民主意识,或者认为政治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或者觉得民主纯粹是一种负担和累赘;现代化建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激发了人们的欲望和期待,但不少人却权利意识强烈而责任和义务观念淡薄,如此等等。可以说,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途程中的每一步都受到了国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羁绊和拖累。

进入 9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全面地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以确认个人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为前提、以市场主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为内在运行机制,它为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创造能力的充分发挥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但同时也对人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个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经济、法律和道义上的全部责任。然而,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于人们的相应文化素质的支撑,社会生活中原本已得到较充分表露的国民的文化素质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之间的不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得更加突出。今天,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人中的行时走俏及其导致的物欲横流、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尔虞我诈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商业化、浅表化和庸俗化,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们正严重地制约着我国市场的正常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固然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人们文化素质的低下却是其中极为关键的一个方面。有感于此,许多有识之士都振臂呼吁应该大力加强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年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并迅速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和响应。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强化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被正式提上了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工作的议事日程。

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乃在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一个标示人的内在世界的特性、状态和修养水平的总括性概念,它是人们通过对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领悟和在特定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养成的内在品质或内在气质。大体上说,人的文化素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的思维能力,包括思维的开拓创新能力、认知判断能力、善恶辨识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二是人的精神境界,它是人的理想、信念、德性、意志、情感等精神要

素的总体发展状态和水平。人的文化素养就是其思维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有机统一。由是观之,人们的文化素质状况也是一个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基本标志,而强化文化素质教育则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人的文化素质是可以借助于特定的学问来加以培养和提高的。伊斯巴哈尼曾说:“缺乏智慧的灵魂是僵死的灵魂,若以学问来加以充实,它就能恢复生气,犹如雨水浇灌荒芜的土地一样。”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都具有同样的作用。对此,近代的弗兰西斯·培根就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他曾指出:“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学问变化气质’。……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在这里,培根在肯定人的文化素质的可塑性和学问对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揭示了不同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起着不同性质和类别的作用。当然,不同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的不同,不仅表现在其作用的性质和类别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作用的大小和方式上,也就是说,有的学问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要显著一些,有的则不那么明显;有的学问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要直接一些,有的则间接一些。应该说,在人类的科学文化体系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或学科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这些学科凝聚着人类长期以来对于宇宙、社会、人生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表达了人类对于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德性、坚强的意志和美好的情感的无限珍重,体现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不息追求,记载了人类千百年来苦苦求索和守望精神家园的曲折心路历程,它们对于疗治现代社会的心理疾患、安抚现代人的灵魂和帮助人们找回失去的精神家园,对于健全人们的心智、促进人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教育,对于增强人们的思维能力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具有十

分直接而显著的作用。在当前的文化素质教育中,我们要特别重视这类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关系密切的学科。

人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离不开对相关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无论是人的思维能力的增强还是精神境界的提高,都必须以相关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扩展为基础和前提。我们之所以说那些直接或间接地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人的文化素质培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们含蕴着特别有助于增强人的思维能力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丰富知识。就此而言,强化文化素质教育,也就是要使人们获取多方面的文化知识,特别是使人们掌握那些对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具有直接和显著作用的学科的丰富知识。但另一方面,人的文化素质并不归结为其所获得的知识,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并不等于他必然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要有效地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不仅要使他们具备尽可能广博的相关文化知识,而且还应使其真正理解和领悟这些知识,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从而能够并善于运用这些知识。正如培根所说:“多诈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是由观察体会才能得到的。”因此,进行文化素质教育,既要注意传授相关的文化知识,更要注意帮助人们深刻地领悟和自觉地运用这些知识,使其真正起到增强人们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世纪风铃——新校园文化素养丛书》。丛书在选题上侧重于与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密切相关的一些学科,力求以一种轻松、活泼而又浸润着严肃思考的方式来阐释这些学科对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人的自我完善和实际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着重在与人的素质培养的关系中发掘这些学科存在、发展的理由和根据,回答这些学科到底能给人们一些什么智慧或对人们有些什么启迪、它们直接间接地对人的

生存、活动和发展特别是对人的思维能力的增强和精神境界的提
高能有什么用处或影响以及它们是怎样实现其作用和影响的等问
题,其目的不在于向读者系统地介绍这些学科的知识,而是要为读
者自觉地选择、接受和领悟这些学科的知识提供认识上的向导。
丛书的编写无意于在学科知识这个静态的层面上去追求自身的完
整性,而是始终坚持以读者这个活生生的对象的知识需求和阅读
心理为内在的参照系,努力做到保持与读者进行开放式的对话和
交流。丛书的作者都是其所涉学科领域中才华出众、很有造诣的
中青年学者,他们的丰富学识和辛勤劳作使得本丛书既具有很高
的学术品位又充满了盎然的生气。

20 世纪即将逝去,21 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新的世纪包孕着
新的机遇和挑战,它必将对人们的文化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亲爱的读者,愿我们这套丛书似世纪风铃,使你从中受到启迪,使
你的文化素质得到提高,使你能够以更加健全的心智从容自若地
走入 21 世纪!

汪信砚

1998 年 10 月于武汉大学

引言

“历史有什么用？”这是 1940 年夏天一个不足 20 岁的年轻人向大名鼎鼎的法国史学家布洛赫提出来的。当时，法国遭希特勒德国闪电战打击，一败涂地，首都巴黎已沦入德国军队的铁蹄之下，南部则为德国傀儡政权控制。而造成法国惨败的原因之一，乃是法国拘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经验，不知变通。历史在这里扮演了一个不太光彩的角色。当然，这个年轻人提出问题的本意，更多的也许在于：在当时法国人民奋起抗敌的情况下，历史既不能提供克敌制胜的良方，更不能变成飞机、大炮、坦克，把德国法西斯从法国领土上赶出去。历史看起来好像是百无一用。

正因如此，年轻人的问题深深地触动了布洛

赫。不久，布洛赫因参与地下抵抗运动被捕，关在德国人的集中营里，丧失了人身自由。可是，他的大脑并未停止工作，而是对历史学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尽管监狱里条件十分恶劣，布洛赫仍能把他的心得写在小笔记本上。1944年6月，布洛赫遇害，其遗作由好友费弗尔整理出版，题为《为史学辩护》。

一门学科的存在，如果需要有人为其辩护，其地位也可见一斑了。不过，布洛赫的辩护看来起了不小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历史学的飞速发展与繁荣，是辩护成功最好的证明。在中国，新中国建立以来，历史学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史学危机的谈论逐渐多了起来。90年代以降，历史学像哲学等古老学科一样，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严重衰退的趋势，以致于国家不得不拿出特殊政策，扶植、保护这些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恐怕又得面对“历史是什么？”“历史有什么用？”这类看似简单幼稚、实则十分严肃的问题了。

人们通常以为，历史就是关于过去的事情。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它对，是因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大体上是已经发生的事。单纯从时间的意义看，它们已成为过去。说它不对，主要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并非所有过去发生的事都会成为历史，

或者说，会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有那些发生在过去，今天我们大体上有据可查的，才有可能成为我们撰写的历史的一部分，包容人类经历的所有事情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也根本不可能写出来。举例来说，一个有写日记习惯的人，如果他能坚持到底，到了晚年，日记就成了他本人一生的记载。但我们可以肯定，他在写日记时会有所选择，记下那些他认为对他来说十分重要的事情，绝不会把他当天所遇所想的，全都巨细无遗地写在他的日记本中。而在晚年，当他回过头来总结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撰写回忆录时，他又会在日记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假如日记后来全部被毁，仅有回忆录被保存下来，我们就只能依据回忆录来看这个人，而回忆录与日记相比，已把他一生的活动大大简化了，很可能只剩下一些大事的纲要。如果与他同时的人也著有回忆录，我们还可以根据其他材料对其回忆录有所增补。但可以肯定，无论我们怎样增补，也无法把他一生的活动全部弄清楚并写出来。人类从猿人中分化出来，至今已有 300 万年。在这 300 万年中，有成文记载的历史不过 5000 年左右。即使以这 5000 年计，人类历史上又该发生了多少事情！如果我们把它们全部记载下来，只怕全人类都放下手中的其他活计而专注于这项工作，也永远做不完。

第二，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完

全与现实隔绝的。恰恰相反，正是现实生活给历史学家寻找新的研究课题提供了灵感。一方面，人类历史具有很大的连续性，今天的许多问题往往起源于昨天或更早的历史时期，还有一些问题则是各个社会阶段都会遇到的。弄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找到解决它们的方法。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门科学，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为社会所需要，因此，历史学家应当关心现实社会，写出适应社会需要的著作。例如，为应付各种自然灾害，人们研究历史上的饥荒与成因，写出了《中国救荒史》一类的著作；针对农村剩余劳力大批进入城市及由此而引发的诸如民工潮、城乡居民关系等问题，有人乃着手研究中国移民史、城市史，试图阐明城市对乡村的依赖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因此，历史绝不只是关于过去的知识，它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以上的分析，历史似应包含两个相互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的层次：一是广义的历史。它大体与人类过去的经历相当，其内容无所不包。举凡人类曾经历过的战争、革命、生产、生活、衣食住行等，无不尽在其中。一是由人类创作的历史。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的范畴大致相当。很明显，它必须以人类过去的经历为基础。没有人类历史的发生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历史学的产生。但是，这类历史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也不管它的篇

幅有多大，都是经过后人对前一类历史进行思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留下来的，是人类劳动，而且是高级的脑力劳动的产物。它只能包含前一类历史极小的一部分内容，浓缩了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主要事件，其中不少对今天的人类仍不无教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代表了人类过去的基本经验。

正因为历史学肩负着总结人类经验的重任，所以历史学家在从事其工作时必须特别谨慎小心。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同时也是最为艰巨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真相，建立真实的历史图景。否则，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以及由此所引申出的经验教训可能就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歪曲和错误的。

可是，要弄清历史的真相并非易事。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刚刚发生的同一件事，不同的人，由于其观察问题的角度、所持立场不同，其叙述也不尽相同。历史学家面对历史上的不同记载，在缺少其他资料佐证的情况下，往往难以判断真伪。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工作十分勤奋的历史学家，每天都在他的阁楼上读书，期望写出一部符合历史真相的史学著作。有一天，马路上发生了一次争吵，争吵发生的地点就在他的阁楼楼下。他居高临下，把争吵的全过程看了个一清二楚。可在第二天，当他就此事连续采访3位目击者时，3人的说法竟各不相同，只有一位的叙述和他本人的观察吻

合。这位学者大为震惊，他想：“仅仅是昨天才发生的事，目击者的说法就如此不同，何况是已经过去了那么久的事！仅凭这些残缺不全的记载，我又怎么可能写出符合历史真相的著作！”绝望之余，他返回阁楼，一把火将自己的藏书和手稿化为灰烬，从此不再研究历史。

应当说，这位学者过于悲观了。诚然，由于历史文献写作者的立场、方法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也会有所不同。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久争不决，往往就是这类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因为留下的资料太少，就成了千古之谜。但大多数问题，只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是可以弄清楚的。就前面所举事例来说，至少还有一人的说法与他看到的相同。如果他继续采访下去，不同的说法也许会更加多，但与他看法相同，相近的人也会相应增加，某些人也许还会提供更加具体的背景资料，使他对这次事件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最终发现事情的真相。

当然，历史上的事件不同于刚刚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件，因为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大多已经作古，我们没法去采访他们，也不可能追问他们在面对某一事件时的态度与思想。考察历史事件，我们只能依据历史上留下的各种文献及实物。而这些文献和实物，尤其是文献，远不足以代表历史的全貌。有些历史文献，本身就是历史人物为了某种动机而伪

造出来的，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相反。因此，我们在使用历史文献时，必须尽可能搜集有关材料，对各种不同记载详加考核，必要和可能时，还要结合文物，或者亲临事件发生地作实地考察，才有可能发现历史的真实。

辨析历史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史料进行解释和重建历史图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渗进他创作的历史著作中去。因此，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同一时代不同的学者，看法会有所不同，对其描述也会各有侧重。举例来说，对于发生于公元前 431 年至公元前 404 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人说雅典应对战争的发生负主要责任，有人则把战争责任一古脑推到斯巴达身上，而且双方都显得证据充足。同样，目前国内通行的几种中国通史著作，由于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看法不同，对某些史料的理解也大有差异，由此并导致了篇章布局和全书结构上的大相径庭。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发挥了作用，影响了他们对历史进程的看法。这样看来，我们所读到的历史著作，或多或少都带有写作者个人的偏见和喜好，不会与历史的实际完全吻合，就像数学上的圆周率一样，有人算到 3，有人算到 3.14，还有人算到 3.1415926。但不管人们怎么算，都只能延长小数点后面的位数，却永远

也不能穷尽它。对于历史，我们也是如此。一代代史学家辛勤的劳动，使小数点以后的位数不断延长，使真实的历史图景离我们越来越近。但究竟何时能让我们的认识和真实的历史百分之百地重合，我们也无法断言。

如此说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岂不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一派胡言，是史学家们在玩弄文字游戏了。这话当然不对。就历史学来说，它至少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历史事实，一是对历史事实的解释。前者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后者则受史学家个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左右。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可对这一事实如何理解？在中国人民看来，它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地主、官僚和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结果，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看来，它昭示了共产主义的胜利，资本主义从此又丧失了一块重要地盘。还有一些人也许会由此检讨美国的对外政策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失误。所以，最能反映一部历史著作特点的，不在于它所提供的史实，而在于它对史实所作的解释。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益趋深刻、准确和完善。以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例，孔子写《春秋》时，主要记录了中原几个诸侯国的史实，司马迁写《史